基層人物的眞實生活，從冰冷繁雜的檔案中還原最鮮活的歷史場景。對於這一研究路徑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們期待作者的後續成果。

杜翼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楊品優，《科舉會社、州縣官紳與區域社會——清代民國江西賓興會的社會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279頁。

無論從何種角度探討清代民國賓興會的歷史，一般都繞不開楊聯陞（1914-1990）1961年為清華校長梅貽琦（1889-1962）祝壽所作的〈科舉時代的赴考旅費問題〉（《清華學報》，第2卷，第2期〔1961年6月〕，頁116-130）。在這份開拓性的研究中，楊聯陞討論唐宋以至清代赴考士子籌措旅費的各種方式，賓興會助學即其中之一。他不僅深刻揭示「賓興」由「官紳士民公建」、具有「人民自治」的特質，還敏銳地點明未來兩種可供繼續開拓的研究方向：一是從「社會經濟史方面」討論基金觀念、發商生息舉動、紳商士民自治等，二是從「史地關係」討論地域人文與義舉互為因果的關係。可以說，楊聯陞已經注意到，要進一步揭示賓興助學的機制，必須將之聯繫到資金的運轉、人的活動以及產生的具體地域社會背景。循此脈絡，讀者不難看到，不管研究者自身是否意識到，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這項議題的研究，實際上都沒有超越前述楊聯陞提示的思路。問題在於，如何推進資料，積累史實，揭示賓興助學發生、發展機制，在深度和廣度上回應楊聯陞的洞見。目前為止，楊品優的新著《科舉會社、州縣官紳與區域社會——清代民國江西賓興會的社會史研究》（以下簡稱「楊著」）可能是把上述兩個方向結合得最為密切的成果，從而提供這個研究領域最有深度的認識。

除緒論、結語外，楊著共分五章。全書的撰寫架構以時間為軸線，依序討論清代至民國時期江西地區賓興會興起、發展、轉變和消亡的過程。作者開宗明義指出，對這一科舉會社發展演變歷史的分析，着眼點是「晚清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目的是揭示「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內在機制（頁3）。他批評以往的研究「未能關注賓興會興起的制度與社會背景」，「沒有從嘉道以來王朝國家的大歷史看賓興會」，因此是「孤立的、獨立的、個案的分析」，「這樣的研究無法再現那個大的歷史與時代」（頁22）。

楊著第一章以「清嘉慶、道光朝江西賓興會的興起」為題，主要探討兩個問題：江西賓興會興起的社會背景以及內部運作方式。過去楊聯陞綜括賓興等義舉組織「往往起於一個較長的朝代的中葉或以後」，認為其中主要的因素，「可能是朝代之興，大抵先有個軍事時期，此後要相當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中的人，才能行有餘力」，指出「帝國內若干區域，經過長期安定，經濟發展。地方首長，紳士商民，有機會發揮他們的組織能力。團體福利同互助性質的社會組織，因而興起」（楊聯陞，〈科學時代的赴考旅費問題〉，頁130）。楊著在此宏觀解釋之外，進一步分析清代賓興會興起的制度和社會環境，表明進入嘉慶朝以後，原先雍乾時期對書院、結社政策開始鬆弛，政府和宗族組織不足以支援日益龐大的士子赴考旅費，以及朝廷在白蓮教亂後大力提倡崇祀文昌神，都直接影響賓興會遍佈江西乃至全國，至道光末年，江西賓興會已處處林立，發展成為當地最重要的科舉會社組織。通過回顧江西賓興會組建的歷史，各地賓興會的層次和種類，楊著濃墨描述賓興會的經營運作架構，涉及賓興資產的來源和經營管理、建築的形制、賓興活動中鄉紳的角色以及助考的效果等，基本勾勒出清代江西賓興會的概貌。

從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分別抓住咸同時期的太平天國動亂、清末民初廢除科舉、民國地方自治及州縣財政體制重建三個關鍵節點，討論晚清至民國時期賓興會面對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轉變而發生的種種調適。

作者的研究表明，由於太平天國戰爭的衝擊，江西賓興會絕處逢生，其資產經費或用於捐輸，請獎學額，或被官府挪用，或因典商歇業而出現分化、重組甚至瓦解。然而，由於戰後學額的增廣和大量團練餘資存在，也催生出另一批賓興會。最引人矚目的是，戰後江西賓興會大多改稱「賓興局」，他們手握巨額地方資產，由地方頭面人物把控，逐步由助考組織演變成為地方權力機構。從作者詳細分析的幾個地區，如南安府南康縣、瑞州府上高縣、臨江府清江縣，均可看出，賓興局直接的地方事務遠遠超出助學、助考範疇，儼然成為政府派出機構，作者稱之為「一種準政府組織」（頁139）。在這裡，作者的討論深受孔飛力(Philip A. Kuhn)有關晚清地方軍事化研究的影響，後者闡述「傳統國家的崩潰」之要點，即在於地方權力如何旁落到各地名流士紳之手。顯然，江西賓興會的轉變也清晰反映這樣一種趨勢。

清末民初科舉廢除，教育和考試制度發生根本改變，原來以助學、助考為主要功能的賓興會隨之發生變化。楊著運用各種案例指出，有些賓興會改稱勸學所，有些直接改為新式學堂。在創辦新式學堂過程中，少數賓興資產被學務總會、教育局等機構接收而消亡，大部份賓興會則繼續資助新式學堂、

學校的學生（包括留洋的學生），原來的「花紅」、「捐資」、「程儀」等名目的獎賞改為「津貼」。

對於賓興會在晚清民國地方自治和州縣財政體制重建中的角色，楊著亦有比較深入的分析。作者以吉安省西坊廓公所、萬載客籍東洲公局為例，結合對地方社會歷史背景的分析，討論兩地賓興會如何強化地方精英的傳統政治作用，直接參與地方自治。作者指出，無論是吉安省西坊廓公所，抑或萬載客籍東洲公局，兩個地域組織的基礎都是道光年間當地的賓興會。兩地士民都必須首先認捐賓興、義倉等方能參與到地方政治圈子。雖然科舉考試早已廢除，但賓興會的組織形式、運作理念及其對地方社會的支配卻延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種「科舉會社佔主導地位的區域社會的歷史」，作者認為，「表明了地域社會歷史發展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多種可能性，為我們重新認識民國地方社會的歷史提供了很好的例證」（頁192）。楊著進一步分析，作為地方自治政策的一部份，隨着地方財政體制的重建，賓興等地方公產也成為「建立現代地方財政的資產來源」（頁193）。以南康縣賓興局為例，這個當地最大的公產機構在咸同時期就承擔許多地方事務，賓興事務分為賓興和當鋪，是縣有財產的主體部份，民國元年（1912）後直接改為地方財政局。而清江賓興局、尋烏賓興局的例子則表明，相當大一部份地方公產成為政府、軍隊任意索取挪用的對象，許多賓興公產因此消失殆盡，劃上歷史句號。

楊著的論述，建立在扎實的文獻資料蒐集和實地調查基礎之上。全書依據的文獻資料，以地方賓興資料、地方志書、檔案、文史資料、報刊資料和個人著述為主，其中對江西賓興志、賓興冊、試館志和書院志等了解賓興會核心文獻的整理可謂窮盡搜羅，因此才有可能在前輩時賢的大量研究成果上面對賓興助學發生發展的機制做出更有深度、也更貼近歷史事實的分析。在問題意識上，作者亦不囿於一時一地、一事一物的討論，始終圍繞如何透過賓興會組織的演變，去觀察近代以來國家和社會的大轉變，故能繞開一般社會史研究者常見的「自說自話」、「畫地為牢」的陷阱，得以由細微處見其深、見其遠、且見人所未見處。此為楊著予以讀者最為強烈的觀感和啟發。

綜合來說，楊著仍值得商榷之處至少有三：

第一，結構佈局尚可完善。如前所述，楊著除緒論、結語外，共分五章，以時間為線討論清代至民國時期江西賓興會的演變。與其他章節相比，第三章討論廢除科舉後賓興會的適應與轉變及第五章分析賓興局等地方共產參與地方財政體制的內容篇幅較少，內容單薄。如此佈局，部份是由於相關

議題的文獻資料匱乏，非作者才力不及，部份也是由於作者過分執着於要把賓興會的演變置於我們熟知的「太平天國」、「清末新政」、「科舉停廢」、「地方自治」等「大歷史」中。避免章節間輕重不均之嫌，可能需要回到賓興會自身的「小歷史」。由作者的研究可知，實際上其演變不外乎經歷兩個階段：「興起」與「轉型」。後者自然又包括上述數次「大歷史」轉折中其功能、地位和去向的種種變化。

第二，背景分析稍嫌薄弱。這裡的「背景」，包括作者強調的大的國家歷史背景和孕育賓興會的區域社會背景。和其他賓興研究者一樣，作者均注意到「楊聯陞是最早關注清代賓興類助學組織的學者」（頁208），並試圖批評楊聯陞對賓興組織興起原因的解釋失於鳥瞰泛論。姑且不論鳥瞰綜括恰是楊文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楊著把賓興會興起的原因主要歸結於嘉慶時期的「王朝氣象」，甚至聯繫到更為久遠的明代中期一條鞭法改革後的社會轉型，而疏於分析楊聯陞提示的地域人文背景，實際上不小心也掉入「泛論」的陷阱。近年來學術界掀起重新評估嘉慶朝歷史地位和意義的趨勢，相關討論反對把嘉慶朝視為缺乏「存在感」的時代，認為這一時期內政外交的改革均有重大變化。相關研究以 *Late Imperial China* 第32 卷第 2 期（2011年11月）專號的相關文章以及王文生的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為代表。如作者所言，賓興會興起於這個轉折時期絕非偶然，然則相關的改革如何在江西這個特定場域展開？當曠日持久、耗費朝廷最大精力的內陸白蓮教亂和沿海華南海盜問題發生之際，江西又在經歷什麼？筆者相信作者也完全意識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牽涉議題千絲萬縷，雖然作者努力勾勒賓興會如何參與其中，但案例奇少，具體的社會背景和歷史進程也未盡闡明。就全書主旨而言，這或許多少也會影響我們對開篇提出揭示「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認可。

第三，比較研究有待加強。江西地區是賓興會組織最為盛行的區域之一，相關研究較多。全書以南康縣賓興局、清江賓興局、尋烏賓興局、吉安省西坊廓公所、萬載客籍東洲公局等較少前人關注的豐富案例揭示賓興會組織的運作機制，貢獻頗多，若能更多地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比較，或許亦有助於勾勒出更為完整的江西賓興會的社會史。

陳賢波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